

从权力话语理论看英语词汇的社会性别区隔功能^①

刘玲媛¹, 彭利元²

(湖南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 湖南 株洲 412008)

摘要: 布尔迪厄的“文化权力”理论认为语言具有区分社会阶层的功能,根据福柯的权利话语理论,权利与话语是不可分割的,英语词汇区别社会性别的功能体现在词汇的性别歧视上,主要表现在男性词汇的泛化、女性职业词汇的缺失、女性词汇的贬低化三个方面。

关键词: 文化权力; 权力话语; 区隔; 社会性别; 性别歧视

中图分类号: H0-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10)03-0120-03

Social Gender Distinguishing Function of English
Vocabulary from Power Discourse Theory

LIU Lingyuan, PENG Liyuan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zhou, Hunan, 412008)

Abstract: Pierre Bourdieu's "Culture and Power" theory holds that languages help differentiate social classes. According to Michal Foucault's power discourse theory, the function of English words helping distinguish social genders is embodied in three aspects; masculine words are more prevalent; there lack words for female professions; and feminine words tend to have a derogatory sense.

Key words: culture and power; power discourse; difference; social gender; sexual discrimination

布尔迪厄的“文化权力”理论认为现代社会的文化是独立于经济和政治的,专家团体是文化自主发展的驱动力。但文化也是一种权力,一种能够把现存社会安排合法化的符号权力,这种权力因而常常与经济资本或政治权力相交换。而所有的文化符号与实践——从艺术趣味、服饰风格、饮食习惯,到宗教、科学、哲学乃至语言——都体现了社会“区隔”(difference)即区分和隔离不同阶层的功能。^{[1]173}在社会生活中,语言对男女两性是一视同仁的,它本身没有性别歧视,但使用者赋予它们性别色彩,并扣上了“男尊女卑”的帽子,语言作为社会的一面镜子和一种社交工具,它的使用不可避免反映了人们的社会观念和社会风俗,因而语言也就具

备了用来区隔不同性别不同阶层的功能,这就有了性别语言和阶层语言,而这些不管是性别语言还是阶层语言都与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息息相关。按照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话语和权力是辨证的同构关系。影响、控制话语运动的最根本因素是权力,权力是通过话语来实现的。话语既是权力的产物,又是权力的组成部分。他认为所有的社会现象中都有权力关系的存在。权力不是一种可以简单获得和转让的商品,而是一种网络,其特点是能够蔓延到任何一个角落。^{[2]160}丹麦语言学家 Jespersen 早在 1923 年出版的《语言与结构》一书中就指出:“英语是他所熟悉的所有语言中最男性化的语言”。^{[3]121}笔者认为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能够深刻地揭示英

① 收稿日期: 2010-04-12

作者简介: 刘玲媛(1983-),女,湖南益阳人,湖南工业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与实践;
彭利元(1969-),男,湖南邵阳人,湖南工业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南开大学博士后,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与实践。

语的社会区分功能的社会性、背后的操控因素和它在社会现实中的指导作用。因此,本文试图采用权力话语理论,从英语词汇和词义方面来分析英语的社会区分功能,以便更好更充分地理解和运用福柯的权利话语理论,不断地提升女性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努力减少语言中的性别歧视现象。

福柯所指的“话语”,从狭义上可以理解为“语言”的形式;从广义上,它又涵盖了文化生活的所有形式和范畴。因而,对“话语”的分析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制度等。^[4]⁴⁵²福柯认为,权力和话语是不可分割的。例如,知识和真理是权力的象征,通过掌握知识和真理的话语权,人们可以掌握权力。所有的社会活动都会受到这些权力话语的支配,而语言交际又是人类最基本和最重要的社会活动之一,因而,也必然会受到这些权力话语的支配或影响。

一、英语词汇的社会性别区隔功能

语言的主体——人,可以按性别分成男性和女性,不同的性别对语言的态度是不同的,语言对男性和女性的描写也是不同的。“性别”在语言中可以理解为自然的性别差异(Sex difference)和性的性别差异(Gender difference),这有助于我们理解性别的双重性。^[5]⁴⁷一般认为,语言是社会现实的反映,语言中存在的性别差异以及性别歧视正是现实生活的反映,正是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制度等社会现实在性别话语中的体现,带有歧视的性别话语体现了男女两性在社会权力领域的不均匀,不协调。这里讨论的是英语词汇的社会性别区隔功能,因为词汇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最为密切,社会发展变化最先体现在词汇当中。透过词汇的意义,可以看到文化里渗透的性别歧视。

(一)男性词汇的泛化

在英语中,男性词汇泛化主要体现在一些代词和名词的使用上,而最能代表男性至上思想的代词莫过于 he/him/his,这些词可以泛指两性。虽然 he/him/his 在语法上只表示阳性,但在实际应用中已经成了中性词,兼指男女两性。很多表示男性的词也用来兼指男女两性,如 man,其含义比 woman 要宽,除了指成年男子之外,也可以用 man 来泛指包括女性在内的“人们”,“某人”等等。在英语中“人类”用 mankind 来表达而不是 womankind,“历史”是 history 而非 herstory。英语词汇中带有此类痕迹的词

比比皆是,如 forefather, manpower, corpsman 等,这些词所涉及的主要是户外活动、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人类的祖先是 forefather,而不是 foremother;人力既包括男性又包括女性,却是由一个有男性标志的词 manpower 来包含男女两性,而非 womanpower;士兵 corpsman 也是同样如此。英语中,学识,权威,名誉,这类词基本上都带上了男性的标示。

男性词的泛化还体现在男性词可以用来指男女两性,但是女性词只能指女性。比如我们说女服务员时可以用 waiter,但是绝对不能用 waitress 来指男服务员。而表示女性的阴性词则多在男性词之后加粘着词素构成,例如: host/hostess; waiter/waitress; hero/heroine; actor/actress; god/goddess; steward/stewardess; usher/usherette; Comedien/Comedienne, etc.

(二)女性职业词汇的缺失

一直以来,人们认为许多普通的甚至下层的职业,如护士(nurse)、秘书(secretary)、模特(model)等,是女性所应当从事的职业,而那些受人尊重的职业,如教授(professor)、医生(doctor)、律师(lawyer)、工程师(engineer)、科学家(scientist)、参议院议员(senator)等,则被视为男人的专利。因为从历史上看,以前女性在这些领域中几乎无一席之地。如果有女性从事这些职业而要指称他们时,需要在表示职业的词汇前面加上 female, lady, woman 等显示性别的女性词,例如 woman professor; lady doctor; lady lawyer; female scientist; female senator。

(三)女性词汇的贬低化

英语中有许多专指男性和女性的词,但是后者往往带有贬义。例如 bachelor 和 spinster 均指到了结婚年龄而未结婚的人,但其涵义却不同。前者暗示着正派、独立和性自由,而后者却蕴含着丑陋、性冷淡和无能。Governor 代表权力无比的统治者,而其对应词 governess 则是家庭教师,其差别就非常大。许多女性词的意义正在转向或已经转向贬义,甚至还带有淫秽色彩。如: Madam 在旧时专指有地位、有身份的妇女,而如今它的语义已经发生变化,很多时候暗指妓院老鸨。同样, mistress 曾是 master 的对应词,但现在它的意思是情妇。

二、权利话语与性别歧视产生的原因

造成语言中性别歧视的原因有多方面,很多学者从不同的领域提出了各自的看法,比如文化意

识、社会心理、传统观念、经济社会因素等。语言的性别歧视是男女地位不平等的反映,是由于女性在社会生活中地位低下和权力有限造成的。在历史上,妇女处于最底层,受到严重的歧视,被认为是从属于丈夫的。在西方社会,已婚女子在婚后要随丈夫姓,即由原来的 Miss 改成 Mrs,并且在用 Mrs 时,她们还不能用自己的姓,必须用丈夫的姓,说明自己已经“嫁给”别人了,而男性仍用尊称 Mr,该词不会暴露他们的婚姻状况。妇女的社会地位是如此低下,以至于她们在西方社会被视为“商品”和“财产”。根据福柯,权力和话语是不可分割的,权力通过话语来实现。女性要想改变这种语言性别歧视,有很多的工作要做,单靠个人的力量也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女性首先要经济上独立,经济地位的差异是导致男女两性在社会上地位的不同以及体现在词汇上的歧视的最根本原因。福柯关于话语与权利的关系理论表明话语(语言)是众多大众维护、重组社会秩序的有效机制,权利通过话语发挥作用。

福柯的话语权利理论让我们认识到语言远非表象那么简单,它与政治、经济、权利、意识形态以及社会环境因素密切相关。男性语言在整个语言

上所占的优势与男性在经济、政治上的优越地位是分不开的,这样的社会形态必然在意识形态上有所反映,语言是反映现实的,因而语言就出现了男性语言优势,女性语言劣势的局面。虽然人们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尽量使用中性词汇,但是要彻底破除这种状况,还需要长时间的努力。

参考文献:

- [1] 张曙光. 权力话语与文化自觉——关于文化与权力关系问题的哲学思考[J]. 社会科学战线·文化研究, 2008(5): 172-185.
- [2] 张红燕, 易立新. 对权力话语的思考[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6(3): 160-163.
- [3] 叶梅. 管窥英语中的性别歧视现象[J]. 安徽农业大学学报, 2004(1): 121.
- [4] 金敬红, 张艳新. 从话语权力理论看异化翻译[J]. 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5): 451-455.
- [5] 钱进. 语言性别差异研究综述[J]. 甘肃社会科学, 2004(6): 47-50.

责任编辑:李珂

(上接第108页) 若不是,谁占据主导呢? 米勒对这些都未作出解释。但是我们知道,解构主义主张意义在根本上是语言作用的结果,而阐释学的观点是意义出自于读者与文本的对话。那么,米勒此处的观点到底是解构主义的还是阐释学的呢? 我们认为,此时的米勒虽然在理论上认同解构主义的观点,而在实践中却不知不觉地体现出了阐释学倾向,陷入了读者与文本的二元对立关系之中。这仍然是米勒在此阶段理论与实践相互脱节的表现。

以上我们只是粗线条地勾勒了米勒在《小说与重复》中提出的作为重复的解构主义阅读理论,其核心就是:由于文本中的语言符号是自我分裂的,文本本源意义又先天缺失,所以,任何阅读活动都是强行赋予文本某种意义的行为。我们的简单讨论也表明,在米勒的这套阅读理论中隐藏着与解构主义理论相脱节的地方。如果从其后期的理论观点来看,这种脱节的原因在于米勒的语言观仍然残留着形而上学二元主义的影响,比如他还坚持用字面义与比喻义的二元对立来进行解构阅读。当然他在后期较为成功地

作了自我纠正。比如在他后来的《语言的时刻》,他提出了语言“悬置的时刻”。^{[5]14}至于他是如何克服这个困难的,我们将另文讨论。

参考文献:

- [1] Michael Ryan, Review of Repetition and Fiction [J]. MLN, Vol. 97., No. 5, Comparative Literature (Dec, 1982): 1242-1243.
- [2] 程锡麟, 王晓路. 当代美国小说理论[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1: 145.
- [3] Miller, J. Hillis, Fiction and Repetition: Seven English Novels[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2: 3, 16, 17, 144, 167, 178.
- [4] Miller, J. Hillis, Theory Now and Then [M]. Hemel Hempstead: Harvester Wheatsheaf, 1991: 175.
- [5] Miller, J. Hillis, The Linguistic moment [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5: 14.

责任编辑:李珂